



雷蒙·威廉斯： 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

Raymond Williams:
Cultural Studies and “Resources of Hope”

何卫华 著


商务印书馆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 “希望的资源”

Raymond Williams: Cultural Studies and
“Resources of Hope”

何卫华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何卫华
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5361-4

I. ①雷… II. ①何… III. ①雷蒙·威廉斯
(1921-1988)—文化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087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

何卫华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361-4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 1/4

定价:56.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晌,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第 1 章	导论：“流亡者”的政治与雷蒙·威廉斯	1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1
二	威廉斯：威尔士的“流亡者”	8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14
	（一）国外研究现状	15
	（二）国内研究现状	19
四	研究思路和论证框架	23
第 2 章	文化的用途：从文化保守主义到“新左派”	29
一	“文化与社会”：“现代性”与文化保守主义	30
	（一）“现代性”的焦虑与反思	31
	（二）激流中的抉择：退守还是前进	37
二	保守主义与文化：以“利维斯主义”为例	43
	（一）时代的激变与精神的迷失	44
	（二）“伟大的传统”的建构和功用	47
	（三）差别意识与批评的相关性	52
三	“新左派”的缘起和“文化转向”	58
	（一）英国左派政治的危机	58
	（二）“撒切尔主义”与“新时期”	62
	（三）《新左派评论》与“文化战”	65
第 3 章	“文化”的政治与革命的重构	73
一	威廉斯马克思批评的核心理念	74
	（一）“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重新阐释	75
	（二）从“情感结构”到“霸权”	83
二	文化观的重构及其政治意蕴	87
	（一）“作为一整套生活方式的文化”	88
	（二）“共同文化”与共同体	93

三	批判与建构:“文化革命”的双向运思	98
(一)	正在途中的“文化革命”	99
(二)	“走向 2000 年”:理论的建构维度	105
第 4 章	政治干预的新场域:大众传播与共同体	110
一	传播的二律背反:操控与解放	111
(一)	大众传播的崛起及其批判	112
(二)	传播与共同体的建构	116
二	“作为文化形式的电视”与技术的利用	121
(一)	反对技术决定论:“威廉斯—麦克卢汉之争”	122
(二)	“意图”与电视的发明	125
(三)	电视分析与技术的替代性使用	128
三	英国传播体制的图绘与重构	131
(一)	威廉斯及其批判式传播研究范式	132
(二)	传播体制的重构及其意义	138
第 5 章	文化批评:文本阅读与意识形态解构	145
一	威廉斯的文学和文学批评观	146
(一)	“多样化的写作”与“普通的文学”	147
(二)	“情感结构”与文学批评	152
二	《乡村与城市》:文学表征与“对位阅读”	156
(一)	“惯例”与文学空间中的乡村	158
(二)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乡村景观	164
(三)	“反田园诗”与帝国时代的“乡村”	170
三	“被压迫者的回归”与“文化民主化”	175
(一)	“可知共同体”与文学批评	176
(二)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悲剧	183
第 6 章	“理论旅行”:雷蒙·威廉斯与中国文化研究	190
一	意识形态重构与文化研究	191
(一)	中国的精神突围与“现代性”	192
(二)	文化研究的中国“旅行”	196
二	“希望的资源”与中国的大众文化	199
(一)	文化社会学与大众文化	200
(二)	大众文化与被争夺的话语场	204
三	中国文化研究图绘及其使命	209
(一)	中国文化研究地形图	210
(二)	“介入性”知识与文化研究	213

第7章 结语:威廉斯的“幽灵”与文化研究	219
一 “文化战”与威廉斯的文化研究	220
二 “政治失忆症”与文化研究的未来	225
参考文献	230
后 记	242

第1章 导论：“流亡者”的政治与雷蒙·威廉斯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自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以降,大众文化的勃兴及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巨大影响力是当代中国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以市场经济为依托,流行音乐、影视剧、畅销读物、广告、粉丝文化、网络游戏、恶搞文化和时下的“快男超女”等,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面对这些全新的、日益繁荣并贴近民众生活的大众文化现象,及其在社会中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影响力和渗透力,文化研究作为全新的学术领域和理论方式也应运而生,并已开始在中国众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攻城略地”,场面蔚为壮观。然而,回溯中国的文化研究理论(尤其是在早期),不难发现,这些话语很大程度上是漂洋过海地从西方“进口”的舶来品。在20世纪末,随着各种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等西方思潮的翻译和引进,文化研究也开始进入中国。北京、上海和南京的一些学者“得风气之先”,他们以《文艺报》《读书》《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和《文艺评论》等期刊为平台,积极引介各种文化理论思想。在他们的努力下,各种令人目不暇接的新话语蜂拥而入,开始为中国学人所熟悉并成为他们重要的话语资源和理论武器。对这一理论进程,戴锦华曾这样描述,“文化研究之于中国,仍可为其勾勒出一条西方理论的旅行线路:英国(伯明翰学派,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再度发现)→美国(作为跨学科、准学科的文化研究,多元文化论,后殖民理论及其表意实践,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及其族裔研究、性别研究)→亚太地区的文化研究实践(中国)。”^①由于文化研究表现出的政治关切、参与热情

^①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由戴锦华所勾勒的线路图,可见文化研究的渊源通常被追溯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但在有的学者

和现世精神,很快就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在全国引发了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潮,成为中国学界一种重要的言说方式。发展至今日,目前中国的文化研究,可谓是“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到处开花”,^①一时间在中国的高校中,各种关于文化研究的研究机构、期刊和学术网站层出不穷。

然而,在中国文化研究这“争先恐后”的洋为中用的繁华背后,仍然掩饰不住的是其理论上的青涩和逻辑上的混乱。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仓促引进而造成的文化研究理论在时间上的错位,大量理论的同时进入,导致中国学者在接受时无法正确地判断这些理论产生的时间性,误读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学者对文化研究理论的强行征用,无视各种知识和理论在地理上的局限性,不顾中国文化现实的异质性、特殊性和复杂性等多方面的因素,生搬硬套而造成的水土不服。正是由于这种种原因,导致的结果就是,“许多使用者对理论及概念缺乏准确的把握和理解,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在进入中国以后,产生了极大的错位与变形,甚至违背了文化研究的精髓与灵魂。”^②有了这早期的引进、消化和接受,现在重新反思文化研究有着相当的必要性。在这一背景下,重新回顾文化研究的源头,把握其形成机制、成长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研究方法、政治意蕴和思考理路等,对了解文化研究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可借鉴性,实现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并凭借其更好地把控、阐释和参与中国现实有着重要意义,本书的目的就是在这一方面做出探索性尝试,促进文化研究更好地本土化,为中国建设更为和谐的文化秩序和社会生态做出一定的贡献。

通常认为,文化研究肇始于英国。而在英国文化研究传统中,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则是众望所归的精神领袖。威廉斯的思想体系浩瀚博大,但不管就研究对象,还是就研究方法而言,威廉斯的学术著作都属于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这表现在几个不同的层面:通过继承和批判“利维斯主义”,威廉斯将大众文化纳入到学术研究领域,而通常在很多人看来,大众文化是低劣的,缺乏道德关怀、审美功能和社会担当精神;通过质疑当时流行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传统,威廉斯恢复了文化的能动作用和实践品格,使得文化斗争成为革命事业之中的重要一维;通过对文化、大众传播和文学等“希望的资源”的发掘,威廉斯为左派事业注入了全新的时代感,从而重新点燃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他的种种努力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学术空

看来,法兰克福学派也应被看作文化研究的另一渊源。但根据笔者,就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影响而言,后者也主要是经由美国,然后“转口”至中国。

① 陆扬:“文化研究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文化研究》,2008年第8辑,第63页。

② 陶东风、和磊:《文化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间,这就是现今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理论旅行”的文化研究。当然这也许是无心插柳,对此安德鲁·米尔纳(Andrew Milner)也曾强调说,尽管威廉斯很少使用“文化研究”这一概念,但就其学术成果而言,都是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①总的来讲,对于这一学术空间的勘定、缔造和推进,威廉斯功不可没。在某种意义上,现在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都或多或少是“威廉斯主义者”,正如凯瑟琳·盖勒格尔(Catherine Gallagher)所说,“这一领域(文化研究)的缔造,应归功于威廉斯,他对其复杂性和危险的体察入微,无人能及。”^②罗曼·赫拉克(Roman Horak)和莫妮卡·赛迪(Monika Seidl)则直接将威廉斯视为文化研究的“创始祖师之一”^③。总之,就威廉斯在这一领域的奠基性地位和开创性贡献而言,尊其为英国文化研究的肇始者,并非徒托虚言。

文化研究的景象可谓是欣欣向荣,然而关于其定义,至今仍莫衷一是。在谈到文化时,威廉斯曾直言说,“曾无数次,我真希望我从未听说过这个该死的词。”^④其实,不仅文化如此,文化研究的概念同样难以界定。根据斯纳里和维特(J. D. Slary and L. A. Whitt)所言,“文化研究的目的不仅是描述和阐释当代文化与社会实践,而且也以改变现存权力结构为目的”。^⑤这一定义从研究对象、实践品格及其宗旨三个方面,对文化研究进行了限定。在西蒙·杜林(Simon During)看来,文化研究是“一种对当代文化的参与性(engaged)分析。参与性有三层不同的含义:首先,对于排斥、不公正和偏见,它(文化研究)并非持中立的立场,而通常是站在从社会结构中获益最少者的立场之上,这里‘参与’指的就是其政治性和批判性;其次,参与性还指它意在提升和倡导多种形式的文化体验:通过对文化形式本身及其社会基础进行分析,传达更为广泛的文化形式的乐趣;第三点指明了文化研究同其他形式的学术的真正差异,它始终将文化看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将其客体化(objectifying)”。^⑥杜林的这一定义分别从立场、对象和方法三个角

① Andrew Milner, *Re-imagining Cultural Studies: The Promise of Cultural Material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2), p. 10.

② Catherine Gallagher, “Raymond Williams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Christopher Prendergast, ed. *Cultural Materialism: on Raymond Williams*,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p. 310.

③ Monika Seidl, Roman Horak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 *About Raymond William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1.

④ 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Verso, 1981), p. 154.

⑤ J. D. Slary and L. A. Whitt, “Ethics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Lawrence Grossberg et al. 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573.

⑥ Simon During, *Cultural Stud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1.

度，对文化研究进行定位。此外，关于文化研究，在全球享有盛誉的美国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则认为，“被称作文化研究的欲望，不应从理论上将其当作设立一个新的学科的平面图，而最好是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加以理解，因为这一工程的目的在于构建一个‘历史联盟’”。^①这种“历史联盟”的建构，实际上也就是要对政治行动的主体进行召唤。在《比较文学概论》一书中，杨乃乔等也总结说，“文化研究不是一种审美性的文学批评，而是重在完成其政治使命，即揭开大众文化形式和实践意识形态的机制。”^②这一定义将文化研究区别于文学批评，主要从文化研究的使命来对其进行界定。文化研究的定义还可以列举很多，虽然对文化研究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仔细揣摩这些概念，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观点都强调文化研究不仅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研究绝非纯粹和空洞的知识事件，它的出现和发展更多是一种对社会体制之中存在的压迫、剥削和不平等进行的回应，致力于揭秘和解构各种隐秘的不合理权力关系，并力图提出一套以社会变革为意图的行动方案和政治筹划，其最根本性的着眼点在于建设更为人性化、平等和和谐的社会形态，因此文化研究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意图。

这种对文化研究政治相关性的强调，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实践同样为其提供了佐证。作为文化研究的“始祖”，威廉斯有着十分坚定的社会主义政治立场，对这位学生时代就加入过共产党并一直活跃于左翼阵线的老师，他的学生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评论说，“(威廉斯的)社会主义使命感是如此深刻和毫不妥协，以至于有时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有人有什么别的信仰，威廉斯会觉得是多么不可思议。”^③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也认为，“威廉斯对今天的最大贡献不是教导我们如何历史地思考文化实践，也不是告诉我们如何通过微妙的文化唯物主义来接近政治，尽管这些成就举足轻重。他对今天最大的贡献在于：在一个普遍去道德化和对进步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不断边缘化的时代，当代的左翼知识分子应如何通过沉默的力量和严肃的反思，来阐释和继续这种先知般的职业。”^④这些评论，充分说明了威廉斯内心的坚守以及文化研究同左派政治间的关联。不难看

① Fredric Jameson, "On 'Cultural Studies'," *Social Text*, no. 34, (1993), p. 17.

② 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5页。

③ Terry Eagleton, "Introduction," in Terry Eagleton, ed. *Raymond Williams: Crit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p. 7.

④ Cornel West, "In Memoriam: The Legacy of Raymond Williams," in Prendergast, ed. *Cultural Materialism: on Raymond Williams*, p. ix.

出,正是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和政治追求,使得威廉斯将文字作为“投枪和匕首”,激烈地批判保守的英国文学研究范式和教条马克思主义,并将文化作为“希望的资源”,作为政治干预、改造社会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

当然,在论述文化研究历史时,法兰克福学派经常被视为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资源、范式和路径。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是这一学派早期在理论上的奠基人物。由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和知识背景,以他们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批判摒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主义思考路径,转而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维度,不断思考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全新统治手段、革命主体消解以及反抗策略等问题。在这些学者看来,文化工业不仅消解了文化和艺术的颠覆性和异质性,也麻痹和消解了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大众的主体意识、反思精神和反抗意志,因此他们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强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文化工业的强大力量源于它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结构性剥削这一本质,其生产出来的消费文化为资本主义逻辑所解构,是资本的合谋,它用认同现实社会意识形态的方式来控制和操纵人们的精神、意识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为五光十色的幻象所迷惑,无法看到超越的维度,最终成为“单向度社会”中的“单向度的人”。人们在德波尔(Guy Debord)意义上的“景观”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意义上的“仿像”中徜徉,在消费的狂欢中迷醉,在占有机械复制品的狂喜之中,心甘情愿地接受大众文化及其所掩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操控。因此,以彻底否定的激进姿态,这些流落他乡者致力于揭示大众文化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欺骗性,这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重要议题。

不可否认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对大众文化研究的意义重大而深远,他们的洞见有着里程碑式的作用,但由于他们总体上所具有的精英和启蒙意识,他们对大众的失望以及对大众文化嗤之以鼻地示以轻蔑,最终使其理论在如何改造现实生活 and 如何找到突破口这些问题上显得甚为悲观,缺乏采取行动的信心的必然结果就是无法展望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关于法兰克福学派中乌托邦前景的丧失,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评价道,“现在放弃意识形态批判就是犯罪,当然,没有丢掉的是批判的方法:分析的程序,赞成好的,反对坏的,谴责的需要,对现在所有事物的揭露。……但是不存在明确的希望,结果不是退入怀疑主义或犬儒主义,而是陷入了悲伤。”^①这一点相当精辟地指出了法兰克福学派存在的问题,批判固然重要,

① [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1页。

但拆解之后的重新建构同样不容回避。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毫无疑问是深刻且有力度的，同时对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具备的意识形态和收编功能也有着深刻见解，但在强大的资本主义现实面前，法兰克福学派在人的主体性的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悲观情绪，再加上其在反抗方式上表现出的浪漫主义色彩，导致的结果就是容易滋生出一种愤世嫉俗和失败主义的论调，远景的缺失使得人们只能是原地踏步。

和法兰克福学派相比，威廉斯开创的文化研究路径则有着自身的独特魅力。威廉斯从未放弃自己的人道主义立场，在他看来，人的欲望、情感、意识、意志和判断力都是不可化简的，因此人总是具有能动性，是创造者和行动者。关于未来，威廉斯是乐观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从来都不是他的选择，并且威廉斯著述的字里行间始终洋溢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等人论及的文化工业具备强大的迷惑、收编和操控作用，严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论及的革命行动主体的主体能动性，所有努力、行动或斗争也都会因这种悲观气息而黯然失色，然而在威廉斯看来，“没有任何生产模式，没有任何主导性社会或社会秩序，也没有任何主导性文化，能够真正穷尽全面的人类实践、人类能量和人类意图。”^①因此，在革命主体这一问题上，威廉斯并没有陷入怀旧主义，对于将来，威廉斯并没有堕入反理性或反科学主义，他的眼光始终是理性的，后工业社会既不是“弥赛亚”，也不是“恶托邦”，既无需对其一味称颂，顶礼膜拜，也无须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而大加挞伐。温情的人道主义并非“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可以被轻易地抹除，对人的主体性和能动作用的坚持赋予他展望和探索将来的勇气。对于文化，他的态度也更为辩证，认为在媒体技术和信息存储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如果能对占有、分配和运作形式进行改革的话，就可以促进参与性民主的实现。这种理性的眼光，使得威廉斯不只是一位批判者或破坏者，只破不立，他同样是一位建设者，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不仅勾勒社会主义的远景以导引实践，并在批评实践中开创了新的思考路径和思想空间，从而不断寻找、比较和论证通往这一远景的突破口、力量之源和理想途径。换言之，面对社会中的主导意识形态结构，威廉斯不仅要进行“文化造反”；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在为理想社会的实现探索可能的策略和途径。当然，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和以威廉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传统旨趣殊异，但在理论渊源上，由于都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这两派之间仍然存在亲缘性。不管对英

^①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Materialism: Selected Essay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p. 43.

国文化研究传统，还是对于法兰克福学派而言，文化研究都是为更完美、更理想和更为和谐的社会和生活而斗争的政治筹划，而绝非一套纯粹的知识话语或学术时尚，在这里，这两种文化研究传统可以找到精神上的汇合点。

当下，在中国，一些学者给予了文化研究热情的拥抱，因为对于描绘、解释和参与中国当下的文化景观，这一新的学术范式的确可以提供独特的视角和有力的理论武器。因此，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播散，有着切实的客观现实原因，正如中国学者冯宪光所说，“文化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兴起，并不是追捧西方学术时髦病症的重新复发，而是一种学术理性的选择。”^①但与此同时，由于文化研究的当下性、反精英主义立场、政治趣味、跨学科性以及由此而表现出的和既定体制的格格不入，这些特性使得文化研究在中国一开始就极具争议。近些年来，由于文化研究的庸俗化，更是使得一些学者对文化研究侧目而视。因此，一方面是文化研究如火如荼，成为学界显学；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研究显露出的问题，让众多有责任感的学者忧心忡忡。文化研究已经沦落为又一种风行的学术时尚，由此而导致文化研究的“去政治化”或“政治贫血”就是这众多的“病症”之一。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现状，学者陆建德曾指出，“文化研究在我国学界只是停留在空洞的‘理论’关怀的层面上，它和‘后现代’之类的词语泡沫一样，是一个给人以方便和制高点的口号，一种‘与世界接轨’的动人姿态。”^②中国文化研究学者虽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这一“诊断”仍然指出了中国文化研究存在的不少问题，笔者同样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热，有的只是“文化研究理论引介热”。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具有本土意识的文化研究的塑形，在初期这种理论的引介、移译和播散意义极为重大。^③但时至今日，这种倾向的确应引起足够重视，因为如果仍然仅仅停留在引介层面，而不是将其同描绘、阐释和改造中国本土文化生态和社会秩序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将不仅严重损害文化研究应有的批判精神，也将使其丧失应有的政治干预能力。正是这一原因，也正是在此关键时刻，尽管这个时代有太多紧要的理论、政治和文化问题召唤我们进行思考，重温威廉斯仍然显得重要、必要和紧迫。

① 冯宪光：《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7页。

② 陆建德：《词语的政治学》，《读书》，2005年第3期，第32页。

③ 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看来，美国在60和70年代也经历过一个相似的过程，当时在美国学界也出现过同样的理论引介热，但后来经过努力，如今这一现象已大为改观。参阅何卫华、朱国华：《图绘世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第2—3页。

二 威廉斯：威尔士的“流亡者”

集文学批评家、思想家、马克思主义者、作家、教育改革家、威尔士民族主义者、媒体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威廉斯一生著述等身，艾伦·奥康纳(Alan O'Connor)为其开列的著述表接近40页。这些令人目眩的成就，以及他的学说在学界产生的广泛影响力，众多学者只能高山仰止；同时，其视野之开阔，作品涉及领域之众多，思想之深刻，也鲜有人能及。

关于威廉斯的盛誉，他昔日的战友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曾撰文说，“如果真有个‘新左派’的话，那么他(雷蒙·威廉斯)将是我们之中的最杰出者。”^①当代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也饱含敬意地说道，“到目前为止，出身于西方工人阶级的最杰出的思想家恐怕要算是一位英国佬，那就是雷蒙·威廉斯。”^②对威廉斯知根知底、他昔日的学生、如今也是叱咤学术疆场的风云人物伊格尔顿则始终将威廉斯视为一位父亲般的人物，在评价威廉斯的学术成就时，他说道，“20世纪英国唯一最具大师风范、最具原创性的文化思想家，非威廉斯莫属。”^③而学者吉姆·麦圭根(Jim McGuigan)则直接将威廉斯称为“现代英国最为伟大的文化理论家”。^④除此外，詹姆逊、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萨伊德(Edward Said)等众多著名学者同样都不断向他致敬，在著述中援引、评介和推举他的观点。也许所有赞誉都可以归结为罗宾·布莱克布恩(Robin Blackburn)的一句话，那就是威廉斯是“英语世界上最权威、最坚定、也是最有原创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⑤这些评论充满敬意而又满怀深情，从这些言语之中，不难看出威廉斯在学术领域的重要性以及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

诋毁和赞誉总是孪生姊妹，事实上，对威廉斯的指责也从未间断，在他接受剑桥大学的教职并前往任职时，剑桥一位同事在《剑桥评论》(Cam-

① Edward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Part 1)," *New Left Review*, no. 9, (May-June 1961), p. 24.

②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p. 105.

③ Terry Eagleton, "Foreword," in Alan O'Connor, *Raymond Williams: Writing, Culture, Politics*, (Oxford: Blackwell, 1989), p. vii.

④ Jim McGuigan (ed.), *Raymond Williams on Culture and Society: Essential Writing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4, p. xv.

⑤ Robin Blackburn, "Introduction," in Raymond Williams, *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9), p. IX.

bridge Review)撰文,以揶揄的笔调将威廉斯描述为“英国的激进主义者、离经叛道的斯大林主义者、托洛茨基式的知识分子,校外教育学院、社区中心和某几所北方大学是这些人的大本营”。^① 他的理论建构同样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安东尼·巴内特(Anthony Barnett)认为威廉斯是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代表,指出经济主义(economism)将斗争化简到纯粹的生产领域,而威廉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策略与之共享着相同的逻辑。^② 甚至他的学生伊格尔顿也曾反戈相击,将威廉斯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斥为民粹主义,认为他对普通民众的信任,认为他们也可以生成通往社会主义的意义,不过是“浪漫的民粹主义”。^③ 此外,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后”理论的兴起,威廉斯文化理论之中存在的一些“盲区”,以及他的理论阐述中存在的种种现代主义“残余”,更是让威廉斯显得有些“过时”、守旧和不合时宜。但无论如何,这就是威廉斯,声名卓著而又备受争议。

借用威廉斯自己曾阐发过的概念,也许可以更好地对他进行定位。在《长期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中,威廉斯区分了“流亡者”(exile)和“流浪者”(vagrant):“流亡者”不同于“流浪者”,后者行踪不定,无所期冀,而前者坚守自己的信念、价值观和原则,企盼社会能够朝着理想的方向改变。作为威廉斯的“膜拜者”和“同路人”,萨伊德对“流亡”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萨伊德指出,跨越边界的“流亡者”无根无基,“处于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④ 当别人主要局囿于“一种文化、一种历史、一种环境、一个家园”时;“流亡者”在空间上流徙的经历赋予他们双重的甚至多重的观察事物的视角,这种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意义上的“无根的或漂浮的状态”让他们能够超然物外,“俯视”的姿态和“复调”的意识让他们看到、感受和体会到别人看不到、感受和体会不到的事物。此外,遗留在身后的故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供比较的参照系统,从而开阔和丰富了他们的视界,让他们意识和洞察到同时存在的不同特质。换言之,比较性的眼光能够打破单一文化、思想和体验造成的隔阂,超越特定社会集团、群体或组织的单一和狭隘局限。正是通过比较而显露出来的差异,可以帮助“流亡者”跳脱本质主义的陈见,看到和明

① Maurice Cowling, "Mr. Raymond Williams," *The Cambridge Review*, May 27, 1961, p. 546.

② See Anthony Barnett, "Raymond Williams and Marxism: a Rejoinder to Terry Eagleton," *New Left Review*, no. 99, (September-October 1976), p. 56.

③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p. 22.

④ 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4), p. 49. 在《知识分子论》这本书中,萨伊德将奈保尔笔下的沙利姆(Salim)、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散文家和历史学家詹姆斯(L. R. James)等视为“流亡者”的典范。

白在一种文化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甚至被尊为神圣的事物背后的历史偶然性和前因后果，从而弃绝定见，形成新颖、超越且具有独创性的眼光。在此一意义上，萨伊德指出，作为一种人生际遇，“流亡”无疑是人生的不幸，但同样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颠沛流离的旅程在制造磨难、痛苦和不幸的同时，对距离的跨越，同样会赋予流落、迁徙和寄居他乡的人一定程度上的优越性。具体到威廉斯的一生，不管是就个人的现实人生经历而言，还是就他在精神皈依上的有意抉择而言，都可以将威廉斯理解为这样一位具有独特和深邃眼光的“流亡者”。

威廉斯出身社会底层，根据伊格尔顿的说法，他出生于“一个积极向上的、情感充沛的工人阶级家庭”，^①他的祖父是佃农，后被驱逐，成为铁路工。他的父亲哈里·威廉斯(Harry Williams)曾参加“一战”，作为一名政治激进分子，还参加过1920年的大罢工，并为工党做过很多工作。作为一位铁路信号员，威廉斯父亲的工资并不高，但有着工人阶级特有的勤奋、节俭和正直。在业余时间，威廉斯的父亲不仅种植一些瓜果蔬菜之类的农作物，勤劳的父亲甚至还学会了养蜜蜂，每年都可以收获不少蜂蜜，这些除了供自己家里人食用之外，多余的还可以拿来出售以便贴补家用。在《边陲小城》(Border Country)这部自传体小说中，威廉斯描述的那种半工半农的清贫家庭生活，实际上也就是他自己童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在1921年，威廉斯就降生于威尔士边陲小镇这样的一个普通工人阶级家庭，家境清贫。自幼天资聪颖的威廉斯，在阿伯加维尼(Abergavenny)上中学期间就脱颖而出，终以奖学金生的身份踏入英国最高学府——剑桥大学修习文学。在读书期间，由于“二战”爆发，威廉斯不得不在1941年中断学业，应征入伍，后来成为第21反坦克炮兵团(The 21st Anti-Tank Regiment)的一名士兵。1945年10月，威廉斯在战争结束后回到剑桥大学继续完成学业，最终以一篇关于易卜生的论文顺利毕业。毕业之后，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威廉斯并没有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而是受聘于牛津大学校外学习中心(Oxford University Delegacy for Extra-Mural Studies)，从事成人教育，开始赚钱养家糊口。工作后，威廉斯始终笔耕不辍，著书立说，后几经辗转，最终在1961年回到剑桥大学任教，讲授文学课程，直至退休。

出生并成长于威尔士的边陲小镇，辗转到温文尔雅而又壁垒森严的剑桥大学这所英国精英学府，这不仅仅是地理的跨越，更是精神的跨越。时空

^①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修·博蒙特：《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王杰、贾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